



#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儒家体用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刘红梅, 王 茜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合肥 230601)

**摘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生动概括了其叙事逻辑,彰显了儒家体用观与习近平文化思想之间的内在契合性。以“体用”贯通古今、观照现实,通过梳理儒家体用观蕴含的“体用同源”的核心意蕴,系统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体用”框架、辩证思维、核心价值三个维度上的创造性转化,以及从本体之“体”、主体之“体”、理论之“体”三个方面进行的创新性发展,展现了儒家体用观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价值和深远影响。深入剖析儒家体用观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有利于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化、体系化研究,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创新性的理论思路。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儒家体用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 G120;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5)12-0649-08

##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an concepts of *ti* and *yong* through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LIU Hongmei, WANG Xi

(School of Marxism,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action guide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vividly characterized by clarifying *ti* (essence) and achieving *yong* (application or function), and integrating *ti* and *yong*, which highlights the intrinsic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Confucian concepts of *ti* and *yong*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By connecting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with "*ti* and *yong*" and reflecting on reality, the study explores the core meaning of "*ti* and *yong* being of the same origin",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framework of "*ti* and *yong*",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the core values, as well a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ti*" of noumenon, "*ti*" of subject and "*ti*" of theory. This demonstrates the unique value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Confucian concepts of *ti* and *yong*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 deep analysis of the intrinsic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fucian concepts of *ti* and *yong*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the academic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and providing innovative theoretical ideas for building China into a country with a thriving socialist culture.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Confucian concepts of *ti* and *yong*; clarifying *ti* to achieve *yong*; integrating *ti* and *yong*;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25-04-18 网络出版日期:2025-08-28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23D062)

作者简介:刘红梅(1971—),女,合肥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哲学方面的研究。

在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文化思想被正式提出,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sup>[1]</sup>,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高度概括其理论品格,体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体用”辩证思维。

当前学界从“体用”维度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成逻辑研究。刘焕明等<sup>[2]</sup>主要从理论逻辑角度着手,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特征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范畴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发展,以及对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中形成和发展的;文长春<sup>[3]</sup>进一步从历史突破、理论继承和实践创新多重维度论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观的生成发展。二是“体用”框架研究。肖伟光<sup>[4]</sup>从明定位、明立场、明领导权、明使命、明方向、明规律六个角度论述习近平文化思想所明何“体”,在巩固文化主体性、实现精神独立性、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等方面阐明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达何“用”;左鹏<sup>[5]</sup>则从十二个方面的创新突破与十六个方面的战略部署着手论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与“达用”,又从“七个着力”出发论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贯通”的具体体现。三是“体用贯通”的历史演进。刘须宽<sup>[6]</sup>厘清了从“体用”二分演化到“体用贯通”的辩证逻辑,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李小标等<sup>[7]</sup>进一步梳理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不二”向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贯通”的演变过程,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传统体用观的传承与超越。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普遍认同体用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已有研究成果多从理论构建和逻辑分析层面展开阐述,但鲜有学者深入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儒家体用观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核心内容、具体形式和实践效果。新时代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使命,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因此,本文以儒家体用观“体用一源”的理论内核为出发点,深入剖析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儒家体用观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内涵,以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以及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阐释。

## 一、“体用一源”:儒家体用观的理论内核

儒家体用观,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思维范式,以“体”与“用”的辩证关系贯穿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等各领域,其蕴含的“体用一源”核心意蕴,充分展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智慧与实践价值。

### (一)意蕴丰富

“体用”作为一种关系性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各学派的思想碰撞与融合中,孕育出极为丰富且多元的内涵,可概括为基本涵义与引申涵义。

从“体用”的基本涵义来看,其一,“体”是事物的物质形态或存在状态,是可感可知的实际存在;“用”是指该事物的属性、作用、功能等。如先秦时期,荀子提出“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初步奠定形体与功能的二分;魏晋南北朝,范缜在《神灭论》中以“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明确“形质神用”的“体用”关系,成为儒家体用观中形体与功能意蕴的典型范式。其二,“体”指向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与普遍规律,是形而上的宇宙本体;“用”代表这一本体在现实世界中的生动表现及其运动变化,即形而下的具体现象。这一本体与现象的“体用”关系,源头可追溯至《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二元框架,虽未明言“体用”,却隐含了本体与现象的层级关系;魏晋时期,王弼指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老子注》四十章),将“无”作为统摄万有的终极本体,确立了本体对现象的统摄地位,虽属玄学范畴,但其“本末”之辨所蕴含的本体论思维,为后世儒家深入探讨“体用”关系提供了思想启发;至宋代,程颐在注解《周易》时首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sup>[8]689</sup>,强调作为本体的“理”与作为现象的“象”同出一源、不可分割,后经朱熹、王阳明等广泛传释和发扬,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方法论,深刻塑造了中国传统哲学对本质与现象统一关系的理解范式。

除此之外,儒家体用观还在哲学思辨与实践运用中衍生出众多引申义,如整体与部分、未发与已发、原理与运用等。就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言,典型的有北宋邵雍“体四用三”的体用论,认为一切存在物皆以“四”为基本存在形式,如“四时”“四象”等构成事物全体,“用三”即全体中三部分发挥作用,以“体用”揭示事物内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就未发与已发的关系而言,《中庸》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以“未发之中”为“体”,“已发之和”为“用”,展现了“体用”在心性修养层面的深刻意涵,朱熹以此为基础,通过“心统性情”说,构建起涵养于未发、省察于已发的修养路径;就原理与运用的关系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有胡瑗“明体达用之学”,以儒家经典蕴含的道德原理与治国之道为

“体”，“用”则是实现这一本体的具体实践手段或方法，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可见，儒家体用观意蕴丰富，运用广泛，其内涵的演变与拓展始终围绕并深化着“体用同源”这一核心命题，亦即无论“体用”如何变化，其深层关系始终指向相涵互成的统一体。

## (二)“体用不二”

在儒家体用观中，“体用”呈现出“不二”的辩证关系，即在承认“体用”差异的基础上，揭示出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的动态关系。这一辩证思维早在《易传》“显诸仁，藏诸用”中已见端倪，蕴含着“体用不二”之义，唐儒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注解道：“‘显诸仁’者，言道之为体，显见仁功，衣被万物，……‘藏诸用’者，谓潜藏功用，不使物知”<sup>[9]</sup>，“道体”通过创生万物的功用昭示其存在，点明本体绝非脱离现象而孤悬，二者浑然一体，不可割裂。

“体用不二”并非将“体用”混同为一，而是承认二者在存在形态和逻辑先后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始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正如程颐所言：“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同源，显微无间”<sup>[8]689</sup>，至微之“体”无形而潜藏，至著之“用”有形而显发；朱熹以“心”喻之：“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sup>[10]390</sup>，这种显与隐、未发与已发的差异，使得“体用”在表面上呈现出一种对立状态。此外，“体用”还存在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儒家提倡“体”立而后“用”，“体”是“用”的基础和前提，“用”是“体”的展开和实现。然而，这种先后关系并非时间上的先后，而是逻辑上的优先，即本体作为逻辑前提先于现象存在。朱熹有言：“有体则有用，有用则有体，不可分先后说”<sup>[10]1946</sup>，二者始终共存共生。更为重要的是，“体用”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体”以“用”为体现，“用”以“体”为依据。正如王夫之所言：“体用相函者也……体以致用，用以备体”<sup>[11]</sup>，“体”的价值和意义只有通过“用”才能得以实现和彰显，“用”的存在和发展亦离不开“体”的支撑和指导。

“体用”之间的相互转化与相互作用，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体”通过“用”的展开得以丰富和完善自身；“用”在“体”的指导下不断发展和创新。正如《易传》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作为“体”，通过阴阳的交替运行来呈现；“阴阳”作为“用”，其消长始终遵循着“道”的内在规律。这种动态的相互作用，使得事物能够在对立中实现统一、在统一中不断发展。

儒家体用观体现了深刻的辩证智慧，它既看到

了“体”与“用”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又深刻揭示了二者之间的相互统一关系。这一思想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事物的本质和现象，还为认识和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 (三)“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的实践导向是“体用同源”思想的终极指向和价值归宿，它将抽象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这一观念贯穿于儒家思想发展始终，从儒家“学以致用”，到宋明理学的“明体达用”，再到清代实学的“实体达用”，展现了儒家体用观立足现实、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质。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始终以“体”为理论根基，以“用”为实践路径，构建起理论与现实的桥梁。儒家思想开创者孔子强调“学以致用”，主张为学的目的在于行道，孟子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强调“民本”“仁政”，旨在实现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荀子提出“礼法并施”的治国理念，将注重内在德性修养的“内圣”之道，向构建政治制度、规范社会秩序的“外王”实践拓展；西汉大儒董仲舒更是在大一统政治格局的需求下，通过“天人感应”的神学化诠释和“三纲五常”的制度化建构，将儒学转化为可操作的经世方案，为后世儒者确立“内圣外王”的实践范式。宋明理学时期，“明体达用”的提出将这一实践导向推向理论新高度。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开展教育，开创了分斋教学、德才兼备的新学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念，更是使“明体”的哲学追求与“达用”的社会担当浑然一体。清代实学家摒弃空谈义理之学风，赋予“经世致用”更强的批判性与实用性。顾炎武洞察晚明空疏学风之流弊，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著成《天下郡国利病书》，对各地农田水利、赋税兵防等进行实地考察，为社会治理提供参考；颜元主张“习行之学”，强调“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著力”（《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将学习与实践紧密结合，反对只谈心性不务实用的空疏学风。

“经世致用”的实践导向使儒家思想既避免陷入空谈义理的玄虚，又防止流于功利主义的短视，而是在“体用同源”中实现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深度融合。

综上，儒家体用观从多元内涵的历史流变、“体用不二”的辩证特质以及“经世致用”的实践导向，为个人修养、社会治理乃至宇宙万物的和谐共生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基础和实践路径。如今，这一哲学智慧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焕发新生。在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儒家体用观进行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不仅深化了对文化“体”与“用”的认识,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 二、创造性转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儒家体用观的现代改造

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sup>[12]</sup>。在深入挖掘儒家体用观的丰富内涵和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对这一传统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主要体现在更新改造层面,即按照时代要求,对儒家体用观中仍具有借鉴价值的部分加以运用和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可概括为“体用”框架的现代重构、辩证思维的赓续传承、核心价值的现代转化三个维度。

### (一)“明体达用”:“体用”框架的现代重构

传统“明体达用”作为儒家体用观的重要体现,强调以儒家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为“体”,以道德修养、润泽斯民、社会和谐为“用”,体现出一种本末、递进关系,即先“明体”后“达用”,并在践行过程中不断推动“体”与“用”相互贯通,它是分析和处理现实问题的逻辑框架和辩证方法。这一框架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虽有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但本质上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带有封建色彩的“体用”框架,在新时代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要求,需要对其进行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

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这一传统智慧,并将其运用于文化建设之中,在理论创新和实践部署的过程中构建起“明体达用”的逻辑框架。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地承袭,而是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习近平文化思想所明之“体”不是为了强化封建制度而设定的用于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纲常名教”,而是一个深刻、全面、开放的科学体系,它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聚焦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并在推陈出新中不断实现自我革新。确立了文化建设之“体”,必然要将其转化为实际应用,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达之“用”不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根本目的的“润泽斯民”,而是真正实现文化为人民服务、切实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习近平明确要求:“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

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sup>[13-14]</sup>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sup>[14]</sup>的伟大使命,不断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更丰富的精神食粮。通过坚守文化之“体”、践行文化之“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强大的引领作用,为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注入更为持久的精神动力。

传统儒家“明体达用”的“体用”框架受时代条件制约,具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和阶级属性,但也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它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这些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本国实际,紧扣人民需求,将“体用”框架运用于真正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

### (二)“体用贯通”:辩证思维的赓续传承

“体用贯通”作为现代意义的表现形式,体现了其对儒家“体用”辩证思维的赓续传承。儒家倡导“体用同源”,“体”中有“用”,“用”中有“体”,“体用”虽有别但终不可分,展现出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辩证关系。

在实际运用中,这一辩证思维多体现在心性义理层面,亦即强调内在修养与外在行为的一致,以及道德原则与社会实践的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吸收了传统“体用”关系的深邃哲理,既延续了中华文化中关于“体”与“用”辩证统一的哲学传统,又结合时代需求将偏重道德修养的“体用”观念扩展到政治、文化领域,“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便揭示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体”“用”之间相互贯通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体用”逻辑框架中,“体”是“用”的存在根据,“用”是“体”的外在表现,深刻展现了“体”与“用”之间的互动发展。这种互动体现在指导原则与行动方案的有机结合,以及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相互促进,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指导原则与行动方案的有机结合,确保文化建设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体”与“用”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完整体系。“体”作为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为文化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明确了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基本要求;而“用”则是“体”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和体现,它将抽象的原则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使文化理念深入人心,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和行动自

觉。在实践中,“体”指导和引领着“用”,“用”不断检验和丰富“体”,使之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推动文化建设与时俱进,充满活力。这种“体”与“用”的良性互动,确保了文化建设既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相互促进,确保文化建设的动态性和发展性。习近平强调:“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sup>[15]</sup>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还重视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16]</sup>文化建设的目标不仅仅是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更重要的是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际,解决现实问题,推动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探索,是文化建设取得实效的关键。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理论与实践相互转化,认为理论创新应当服务于实践探索,而实践探索又能够反过来促进理论的深化与完善。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确保了文化建设具有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使其能够适应时代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 (三)核心价值的现代转化

传统儒家体用观以“体用同源”为核心,强调“体”(本体、实体、原则)与“用”(现象、功用、运用)的辩证统一,其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为对宇宙和谐、伦理秩序与道德实践的整体性追求。在宇宙论层面,儒家以“天理”为“体”,以万物化生为“用”,构建“天人合一”的终极关怀;在伦理道德层面,以“仁”为“体”、以“礼”为“用”,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儒家体用观虽蕴含“体用贯通”的辩证智慧,但其价值实现始终受限于封建等级秩序与封闭的天下观,其核心矛盾在于既高扬“天下大同”的普世伦理理想,又固守“君君臣臣”的等级差序框架;既倡导“民为邦本”的道德主体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将个体价值与血缘伦理、君主权威紧密结合。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sup>[15]</sup>,对传统儒家体用观进行系统梳理与辩证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针对传统儒家体用观中“天下大同”与等级差序的矛盾,习近平文化思想汲取“天下大同”所蕴含的“和谐共生”意识,将其

从传统封闭的天下观中解放出来,拓展至全球视野下的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倡导:“要积极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sup>[17]</sup>这一转化摒弃了封建等级秩序的糟粕,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重新阐释大同理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胸襟格局,积极推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对待“民为邦本”与绝对权威的矛盾时,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激活“民为邦本”的思想内核,将人民的主体地位置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sup>[18]</sup>这一理念超越了传统儒家基于君权和血缘的狭隘框架,强调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创精神与实践力量。

此外,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为儒家体用观注入新的价值内涵,将抽象的哲学思辨转化为具体的、可行的文化建设方法。儒家学派强调“仁体礼用”,但“礼”的规范往往服务于等级秩序,使“仁”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被异化为维护封建纲常的工具。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操守,构建起贯通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共同体。这一价值共同体既吸收中国传统“仁爱”“诚信”等价值观念,又突破了封建伦理的局限,将抽象价值具象化为人们日常行为准则,使其更具操作性和感染力。这不仅赋予了传统价值以新的时代意义,还通过教育、宣传、制度保障等多种方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sup>[13]23</sup>,推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

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诠释了儒家体用观,从“体用”框架的现代重构、辩证思维的赓续传承、核心价值的现代转化三个方面对“体用”范畴进行新时代解读,强调“体”与“用”的辩证统一,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和动力源泉。

## 三、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儒家体用观的开拓创新

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

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sup>[12]</sup>在继承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儒家体用观进行创新性发展,在不断推陈出新中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是弘扬儒家体用观的内在要求和逻辑必然。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儒家体用观的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时代融合层面,即按照时代发展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对“体”与“用”的内涵加以开拓、补充与完善,可概括为本体之“体”、主体之“体”、理论之“体”三个方面。

### (一)本体之“体”:确立“人民本体论”根本理念

就本体意义上的“体”而言,儒家始终倡导以“仁”为本体,并通过“体用”关系深刻体现人的本质、价值与发展。儒家从社会关系角度理解人的本质,强调“人者,仁也”的社会属性。王阳明对此进一步升华:“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sup>[19]968</sup>,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与责任,突出人的社会性本质。在价值层面,儒家主张“天地之性人为贵”,这种价值论确立了人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崇高地位,人并非被动存在,而是能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实践去实现道德理想和社会价值。在发展层面,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人的发展分为不同层次,明确了从个人修养做起,逐步扩展到家庭、国家乃至天下的道德实践路径。王阳明“知行合一论”强调人的内在修养与外在践行相统一,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种“体用互摄”的哲学体系,以“仁”本体统摄人之本质的社会性、价值的超越性、发展的实践性,最终凝结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为当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新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儒家“仁学本体论”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际,确立“人民本体论”根本理念,把人民本体确立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

从人的本质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以文化人”,增强人的本质力量。习近平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sup>[20]</sup>这一观点既关注人的社会属性,也重视人的文化属性,将文化视为人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文化不仅是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源泉,更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通过文化的滋养,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增强人的创造能力,从而增强人的本质力量。正是基于对人的文化属性以及文化塑造作用的深刻理解,习近平

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以文化人”理念,以优秀文化滋养心灵、启迪智慧、涵养品格,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从而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从人的价值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人民创造价值,在创造性实践中实现社会与个体价值的统一。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明的创造者。习近平强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sup>[18]</sup>,将人民视为文化创造最深厚的活力源泉和不竭动力。一方面,人在创造物质和精神文化财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贡献了社会价值,这是人的价值最为深刻的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sup>[14]</sup>,尊重并激发人民首创精神,引导人民在服务社会、贡献文化成果中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人在创造性活动中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也在发展自身能力、确证自我力量中实现自我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倡导“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sup>[21]</sup>,其深层意蕴正是通过高质量文化供给激发人民参与创造、共享成果的热情,并在创造过程中充盈个体的精神世界。

从人的发展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作为其不懈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sup>[22]</sup>。人的全面发展不能局限于物质满足或道德实践,更需要以文化涵养精神世界、构建和谐社会。在物质生活日渐丰裕的当下,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愈发强烈且多元,文化对人的滋养与塑造作用愈发凸显。因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sup>[18]</sup>,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文化建设和全过程。无论是文艺创作聚焦人民生活,反映人民心声,还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让民众便捷地享受丰富的文化资源,均体现了党对于人民利益的深切关怀和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懈努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本体论”的思想观念,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仁学本体论”的精髓,而且在新时代背景下,将儒家哲学中自然意义上的本体论引入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强调了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体现了其对儒家“一

体之仁”本体思想的当代运用与发展。

## (二)主体之“体”: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就主体意义上的“体”而言,儒家体用观强调作为主体的人不仅是血肉之躯,更是具有感知能力和情感活动的意识之“体”。例如,张载所言“体物体身,道之本也,身而体道,其为人也大矣”(《正蒙·大心篇》),概括了儒家“认知—实践—成德”的修养路径,深刻体现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主体作用,这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传》)的主体精神构成了儒家哲学的一大精髓。人所具有的积极主动的主体作用与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不只是对个人修养的要求,也进一步反映出民族的责任与担当,体现了中华文化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使中华文明延绵5000多年仍生生不息、充满生机。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在2023年召开的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sup>[23]</sup>主体性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是指人这一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作用、能力、地位等特性。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主体性归根到底是人的主体性的具体体现”<sup>[24]</sup>,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文化建设过程中所体现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是构建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必经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明确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sup>[25]</sup>,也是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的坚实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发挥人民在创造文化、创造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并将人民的主体性需求作为文化发展的衡量标准,确保文化主体性深深植根于人民的主体性之中。具体来说,构建文化主体性,必须发挥群众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文化建设、文化发展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贴近人民生活,更具生命力和活力。巩固文化主体性,必须满足群众需要,以此作为文化发展的导向,确保文化成果能够反映人民的意愿和心声,满足人民的多元文化需求。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观,不仅促进文化多样性、创新性发展,也使得文化更加贴近人民、服务人民,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无

可替代的作用。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主体性的构建,不仅深刻体现了儒家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而且实现了从注重个人修养到促进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全面发展的重大飞跃。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砥砺前行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华文化自立自强、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坚强的思想保证。

## (三)理论之“体”:以科学理论指明前进方向

就根本原理层面的“体”而言,纵贯数千年历史长河,“体用”始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存在。从先秦孔子“学思行结合”,到宋明时期王阳明主张“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sup>[19]</sup><sup>4</sup>,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再到清朝李颀“明体适用之学”,注重学问与功用的统一,无一不强调“体用”贯通、不可分离。然而在近代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寻找一条适合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提出了“中体西用”观念,试图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理论(“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体制(“体”)之中。这一思想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急需自强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反映了一种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寻求平衡的尝试。但“中体西用”这一观念本身存在着内在矛盾,导致“体用”两概,未能实现中西、“体用”的有机融合。尽管“中体西用”论充满争议,受到各方进步人士的批评和质疑,但它提供了一个在文化碰撞中寻求平衡与融合的框架,引导人们探索如何正确定位“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进而实现其相互协调与融合<sup>[26]</sup>。

面对古今中西文化如何有机结合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给出了正确答案。习近平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第二个结合”,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中国方案。“‘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sup>[23]</sup>这一结合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机械叠加,而是在深刻理解二者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实现双向互动和有机融合,有效克服了“中体西用”观念中“体用”拼凑的缺陷。马克思主义虽然源于西方,但绝不是传统观念中的“西学”,它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超越了地域和文化的界限,对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具有指导意义,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学”,它摒弃了传统文

化中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封建糟粕,提炼并弘扬了其中蕴含的普遍智慧和价值观念,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体”,“用”表现在发挥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坚持以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体”,“用”表现在坚定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守正中创新中“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sup>[23]</sup>。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sup>[15]</sup>这一重要论述将两个“体”形象比喻成“魂脉”和“根脉”,旨在凸显灵魂和根基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第二个结合”是中国文化“即体即用”哲学智慧的生动体现,超越了“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等传统模式,为“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新时代的解答。通过这一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地位的同时,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使二者在实践中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

#### 四、结 语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体用观历经岁月沉淀,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结晶。它所蕴含的深刻哲学思想和辩证思维,不仅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和发扬了儒家体用观的思维精髓,创造性地提出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文化发展新范式,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文以“儒家体用观”作为改造客体与创新对象,深入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仅揭示了这种转化与发展的具体表现和价值意蕴,还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为实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展望未来,应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结合具体实践路径和国际传播案例,进一步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儒家体用观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动机制,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 人民日报, 2023-10-09(01).
- [2] 刘焕明, 贾蓉. 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特征的形成机理及内在逻辑[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1(5): 26-35.
- [3] 文长春. 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观的哲学阐释[J]. 贵州社会科学, 2025(2): 18-25.
- [4] 肖伟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61(2): 12-21.
- [5] 左鹏.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之道”[J]. 前线, 2025(5): 9-12.
- [6] 刘须宽. 从“体用殊”到“体用贯通”的认知逻辑演进: 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背景的分析[J]. 观察与思考, 2024(11): 46-57.
- [7] 李小标, 方红姣. 从体用不二到体用贯通的文化探索[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62(2): 25-36.
- [8]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9]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70.
- [10]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1] 王夫之. 周易外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98.
- [1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203.
- [13]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1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 [15] 习近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 求是, 2023(20): 4-9.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6.
- [17] 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N]. 人民日报, 2014-06-29(02).
- [18]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01).
- [19] 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20]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50.
- [21] 习近平. 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N]. 人民日报, 2021-12-15(01).
- [22] 习近平. 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J]. 求是, 2021(17): 4-20.
- [23]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17): 4-11.
- [24] 陈方刘. “两个结合”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7): 26-32.
- [2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27.
- [26] 张允熠. 文化“综合创新”论与“第二个结合”[J].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2024, 4(2): 16-26.